

· 国际经济 ·

后疫情时期欧洲经济的困境与出路

陆 婷 东 艳

摘要：受新冠疫情影响，欧洲经济在 2020 年上半年陷入萎缩，多项经济数据触及历史低点。为扶持民生，托底经济，欧洲央行、欧盟及其成员国迅速行动，出台了一系列救助纾困措施，避免了经济和金融危机爆发。随着疫情逐渐企稳，即将迈入后疫情时期的欧洲经济仍将面临重重挑战和风险，年内陷入衰退的态势难以得到根本性扭转。未来欧洲经济能否走出困境，将有赖于欧盟能否成功实现经济和战略转型，有效维护多边主义下的全球贸易体系，以及中欧经贸合作能否得到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欧洲经济 新冠疫情 中欧经贸合作

作者简介：陆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东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新冠肺炎在全球范围内的大流行，扰乱了欧洲多国的经济活动。关闭公共场所、限制公众出行等隔离抗疫举措的实施，不仅使欧洲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陷入瘫痪，也使本已显现出疲态的欧洲经济再次遭遇重创，经济活跃度跌至冰点，多项经济数据创下历史新低。为扶持疫情冲击下的民生经济，稳定金融市场，欧盟及其成员国相继采取行动，从货币、财政等多渠道施以救助。随着新冠疫情的日趋缓和，各国开始逐步取消管控，欧盟万亿级的疫情后长期复苏计划亦呼之欲出，欧洲经济即将迈入后疫情时期。通过梳理欧洲近期经济情况与政策走势，本文探讨后疫情时期欧洲经济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就未来欧洲经济如何摆脱困境展开分析。

一、疫情下欧洲的经济形势

（一）经济活动萎缩

受不断蔓延的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欧盟及欧元区各项经济指标均表现疲软，多国服务业和制造业活动因政府颁布的“禁足令”而陷入大面积停摆。反映欧元区整体经济活跃状况的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接连创下有纪录以来的新低，服务业更是哀鸿遍野，2020年4月欧元区服务业PMI触及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5月随着疫情的缓和虽略有抬升，但离扩张收缩分界线仍很远。航空、旅游等行业纷纷向政府求援，表示若无政府纾困，业内50%以上的企业将面临倒闭。

显然，力度空前的封锁抗疫措施正沉重打击着欧洲经济。根据202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20年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将为-7.5%，触及欧元区成立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疫情特别严重的国家如意大利和西班牙，GDP年增长率有可能分别收缩9.1%和8.0%，收缩程度直追二战末期。

事实上，早在新冠疫情爆发前，欧洲经济已显现出增长乏力的态势。自2018年下半年起，欧元区和欧盟GDP的季度同比增速就呈震荡下行的趋势，2019年四季度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和1.2%，均为2014年年中以来的最低季度增速。欧盟第一大经济体、一向被视为经济复苏引擎的德国，在全球贸易环境恶化、外部需求走弱的压力下，2019年全年几乎都处于“熄火”状态，经济增速从2018年的1.5%骤降至2019年的0.6%，季度经济增长也屡屡为负，挣扎在技术性衰退的边缘。不仅如此，德国工业生产指数从2018年11月至2020年2月，连续16个月同比增长为负，显示德国制造业正经历一场严重的萎缩。受其影响，制造业成为拖累欧洲经济增长的重灾区，欧元区制造业PMI自2019年2月起始终位于荣枯线以下，产能利用率也从年初83.1%下滑至年末的81.2%。外需的疲弱也使得欧元区货物和服务出口同比增速大幅下滑，年实际增长率由2018年的3.4%下降至2.5%，导致净出口在2019年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度为负。

与此同时，对经济状况的负面预期以及英国脱欧不确定性不断困扰着欧元区消费者信心，并对居民消费支出形成抑制。2019年，欧元区居民消费支出同比增长1.26%，连续第四年下滑，较英国脱欧公投前的2015年整整下跌了1个百分点。

可以看到，欧洲经济在跨入2020年时已颇具疲态。2019年内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韧性仍存的服务业是维系欧洲经济弱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如今受疫情冲击最大、损失最为严重的也恰恰是服务业，故欧洲在2020年一、二季度陷入衰退已毋庸置疑。

（二）失业率上升风险扩大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欧洲国家劳动力市场状况持续改善，欧盟与欧元区失业率稳步下降，屡次创下 2008 年危机以来的新低。从月度失业率数据来看，欧盟和欧元区的失业率分别从 2019 年 1 月的 6.9% 和 7.8% 下降到 2020 年 2 月的 6.4% 和 7.2%，欧盟和欧元区的青年（25 岁以下）失业率也持续下降，从 2019 年 1 月的 15.5% 和 16.2% 下降到 2020 年 2 月的 14.8% 和 15.2%。不过，尽管维持下行趋势，但与上一年同期欧盟和欧元区失业率均下降 0.8 个百分点的幅度相比，失业率下降幅度明显有所放缓，表明在整体经济承压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改善的空间已日渐收窄。

2020 年 3 月开始，新冠疫情在欧洲的大面积爆发以及经济活动的停摆使得欧盟和欧元区失业率出现再度回升的势头，青年失业率的攀升尤为迅速，4 月欧盟和欧元区青年失业率分别上升至 15.4% 和 15.8%。显然，如果经济停摆持续，中小企业势必难以为继，区域内失业率上升的风险将加速扩大，这也是欧盟成员国疫情刚刚有所企稳就积极筹划重启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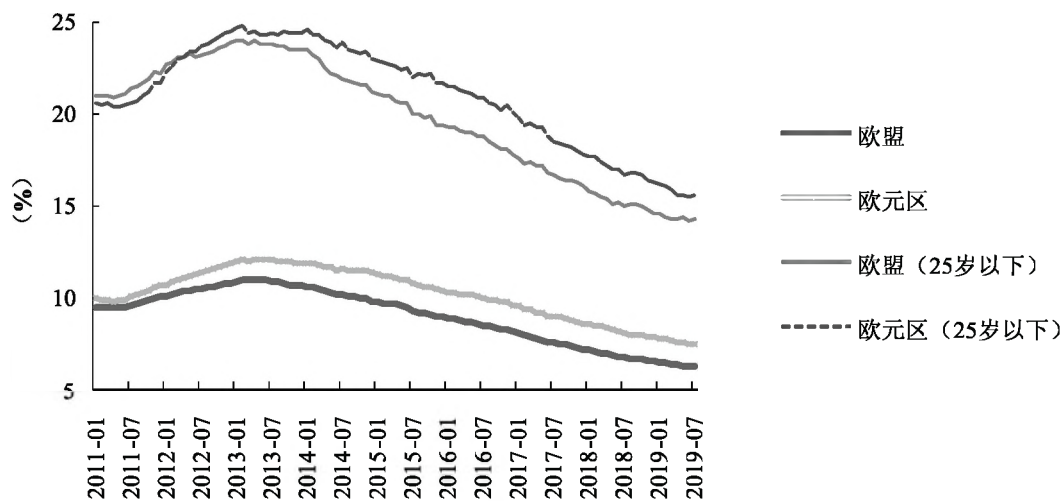


图 1 2011 年 1 月—2019 年 7 月欧盟和欧元区失业率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Eurostat）。

（三）物价水平下行

欧元区的消费价格调和指数（HICP）在 2018 年 10 月触顶后总体呈震荡下行的走势。2019 年，欧元区 HICP 月度平均增长率约为 1.2%，低于 2018 年同期的 1.76%，亦远低于欧央行 2% 的政策目标。从分项来看，能源价格是主导欧元区 HICP 走势的关键，2019 年的二、三季度，在美国库存净增长、全球需求放缓和非石油输出国组织原油供给上升等

多重因素的叠加下，全球石油供需保持在松平衡的状态，能源类产品通胀的同比增速放缓，对整体通胀水平的支撑力度较弱。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和沙特与俄罗斯间的价格战导致国际油价剧烈波动，能源价格在5月下滑12%，创逾十年来最大降幅，进而拖累欧元区5月HICP骤降至0.1%。

剔除波动性较高的能源和非加工食品后，欧元区核心HICP在2019年的平均水平为1.05%，几乎与2018年相同，显示出较为稳定的态势。不过，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3至5月核心HICP也有所下行，但幅度较为温和，符合市场预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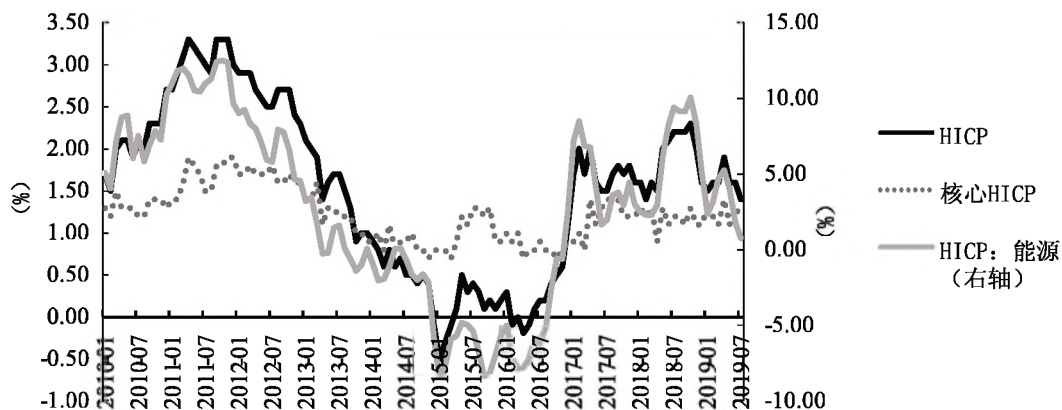


图2 2010年1月—2019年7月欧元区消费价格调和指数及其组成部分

资料来源：Eurostat。

注：数据为当月同比增长率。

（四）经济走势差异化发展

2019年，欧洲出现了核心国经济减速显著，边缘国经济稳步向前的现象。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GDP年增长率都在1.4%以下，而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GDP年增长率均在3%以上。造成这种差异化发展的原因在于，受外部需求冲击和内部政治风险影响最大的主要是核心国，原本对其经济增长构成有力支撑的制造业和出口在冲击下表现萎靡，导致经济增长动能迅速减弱；而边缘国家所受影响则相对较小，经济表现平稳。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德国及法国所受冲击要较边缘国强烈得多，不仅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位居全球前列，隔离管控措施也更加严格，经济活动被迫暂停所带来的伤害也更大。根据IMF在2020年4月的预测，2020年新兴和发展中欧洲国家经济增长将为-5.2%，收缩程度小于英国的-6.2%和欧元区的-7.5%，经济走势差异仍将持续。

二、政策助力欧洲经济纾困

（一）欧洲央行提供流动性支持

在新冠疫情爆发早期，欧洲央行就已积极行动，宣布于 2020 年年底前额外增加 1200 亿欧元资产购买计划，以应对疫情蔓延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欧元区带来的风险。随后，伴随着疫情冲击的迅速扩大，欧洲央行又在 2020 年 3 月 18 日推出了针对新冠疫情的紧急购债计划（PEPP），额度高达 7500 亿欧元，约占欧元区 19 国 GDP 的 7.3%。同时，欧洲央行还增强了购债计划的灵活性，扩大符合购买资格的资产范围并放宽抵押品标准，力求能够为受新冠病毒影响最严重的中小企业和个体提供重点支持。

然而，由于整体经济前景持续恶化，欧元区银行出于对借款人信用风险的担忧，在 2020 年一季度仍然收紧了对企业和家庭的信贷标准。为满足中小企业激增的短期借贷需求，避免流动性危机，欧洲央行在 4 月议息会议上不得不再度出手，下调第三轮长期定向再融资操作（TLTRO III）利率 25 个基点至 -0.5%，向客户发放足够规模贷款的银行甚至可以按 -1% 的利率进行再融资操作。此外，欧洲央行还推出了一项名为疫情应对紧急长期再融资操作（PELTROs）的新计划，该计划将在 5 至 12 月间通过 7 次招标，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固定利率为 -0.25%、期限在一年左右的融资，从而为欧元区金融体系提供即时流动性支持。6 月，欧央行又将 PEPP 规模从 7500 亿欧元扩大至 1.35 万亿欧元，同时将 PEPP 的实施期限延长至 2021 年中。

面对新冠疫情对欧洲经济史无前例的伤害，欧洲央行这一连串向市场全面释放流动性的举措从整体上来看是快速而有效的。以本身主权债务状况较为脆弱，且受疫情冲击程度最深的意大利为例，在 3 月 18 日欧央行推出 PEPP 后，意大利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应声下跌，其与德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由 253 个基点迅速收窄至 190 个基点，此后意大利的国债收益率走势总体表现平稳，未出现欧债危机时暴涨的情况，表明欧洲央行充分的流动性支持较为成功地稳定了市场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欧元区内债务成本的大幅抬升。

（二）财政救助措施发力

为鼓励各成员国政府动用财政政策对抗疫情危机，欧盟自 2020 年 3 月下旬起暂停了对成员国的预算约束，允许成员国自由地根据需要向经济注入财政资源，实施经济纾困计划。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先后推出了自己的财政救助措施，其中，财力相对雄厚的德国出台了规模高达 7500 亿欧元（约为德国 GDP 的 1/5）的一揽子救助方案，并

暂停了宪法中的“债务刹车”条款，这项条款规定德国结构性赤字不能超过 GDP 的 0.35%，暂停该条款意味着政府可无限制发债。法国也宣布了规模为 1100 亿欧元的应急计划，用于扶持企业、增加对医疗系统的支持，以及向贫困户派发现金等。政府债务较高、财政空间受限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则各拨出 250 亿和 170 亿欧元作为直接援助支出，并分别为企业提供 7500 亿和 1000 亿欧元的贷款担保，以帮助企业渡过抗疫期。

除各成员国外，欧盟也推出了规模为 5400 亿欧元的救助包，包括欧盟委员会提供的 1000 亿欧元应对失业保险贷款（SURE）、欧洲投资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的 2000 亿欧元贷款担保，以及欧洲稳定机制（ESM）向成员国提供的不超过该国 2%GDP 的贷款支持（总规模约 2400 亿欧元）。5 月底，欧盟委员会提出设立 7500 亿欧元规模的重建基金，其中 5000 亿欧元将以无偿补贴金形式发放给各国，2500 亿欧元以贷款形式发放。资金分配将倾向于受灾严重、财政困难的南欧（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及东欧（波兰）国家。根据相关计划，这一款项将以欧盟名义在资金市场借贷，今后数十年里由全体成员国共同偿还。然而，该计划仍遭奥地利、荷兰、丹麦和瑞典四国反对，所以方案最终能否达成还未可知。这意味着欧盟目前仍无法就整体层面的财政风险分担寻找到一个良方，经济实力薄弱的成员国想要在市场获得低息融资，依旧只能依靠欧洲央行不断“放水”。

三、后疫情时期欧洲经济面临的挑战

（一）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尽管有货币和财政政策两方面的积极支持，逐步复工后的欧洲经济仍会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这主要由三方面原因造成：首先，疫情发展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就目前情况来看，西欧国家疫情增速稳定，大部分已经进入平台期，而东欧国家疫情的增长仍然较快，距离拐点尚有一段距离。为谨慎起见，欧洲各国此次对隔离管控措施的解除将分阶段、分地域逐步进行，即便排除了遭遇疫情二次冲击的风险，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也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正常。由此可见，欧洲经济活动的恢复将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短期内难以迅速逆转衰退局势。其次，政策对经济刺激效果的显现同样需要时间。现阶段，欧洲各国的救助政策主要解决的是疫情下企业和家庭所面临的现金流短缺问题，通过压低债务成本、增加救济金和收入补助、提供贷款及贷款担保等方式，帮助企业和家庭应对收入的减少或丧失，以及固定支出压力。这样各国才能避免疫情冲击导致的经济衰退转化为企业和家庭的信用违约，从而威胁到银行及金融体系的稳定。宽松货币政策及扩张性财政政策对需求端的提振效果，则需等到疫情全面稳定、经济与社会活动恢复正常之后才能显现。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欧洲经济自身的结构性问题没有得

到改善。从对欧洲经济状况的梳理中可以看到，疫情爆发前，在全球贸易局势紧张的压力下，欧洲就已暴露出经济结构失衡所带来增长脆弱性问题。以欧洲经济的“领头羊”德国为例，降低成本、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是德国经济一直以来的立足之本。2005—2018 年，德国货物出口占 GDP 平均比重为 38%，经常账户盈余占 GDP 比平均为 6.7%，显著高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汽车、机械制造、电子电气和化工制药作为德国传统四大支柱产业，出口规模长期在全部出口商品中保持 50% 左右的占比。这种以出口工业耐用品和中间品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导致德国对全球贸易体系的依赖度极高，且在外需减弱时难以用内需予以替代，进而造成出口贸易与制造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给经济增长带来双重压力。因此，随着 2019 年美国 and 欧盟之间关税战的愈演愈烈，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对全球价值链干扰程度的加深，德国和其他依赖出口制造业的欧洲核心国家，经济表现齐齐下滑。

如今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使欧洲主导和参与的多条价值链遭到冲击，即便欧洲地区疫情有所缓和，全球的贸易和生产也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正常运转。不仅如此，此次疫情还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各国对国际合作体系的不信任，大国间以邻为壑的心态有所上升，疫情平息后，各国可能通过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以保障自身经济运行供给侧的安全，供应链区域化发展的趋势可能得到加强。在这一背景下，欧洲想要依赖其原本的经济结构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枢纽地位来带动经济复苏，恐怕并不容易。

（二）债务及金融风险上升

欧债危机之后，面对较高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欧盟及其成员国一直都致力于施行财政整合计划，以降低政府的财政与债务风险。2019 年欧盟和欧元区一般政府债务占 GDP 比分别为 77.8% 和 84.1%，较 2018 年分别下降了 1.8 和 1.7 个百分点。就欧盟主要国家而言，法国和意大利公共债务占 GDP 比维持了 2018 年的水平，分别为 98.1% 和 134.8%，英国政府债务占 GDP 比由 85.7% 小幅下降到 85.4%，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亦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善，公共债务占 GDP 比分别由 181.2%、122.0% 和 97.6% 下降到 176.6%、117.7% 和 95.5%。

尽管如此，从债务占比的绝对值来看，欧洲多国的政府债务仍处于较高水平，大幅超过欧盟 60% 的警戒线。这也是为何在面对 2019 年区内经济下滑，法国和意大利等成员国想要推行财政刺激时，欧盟仍坚持不肯放松财政纪律的原因所在。此次为应对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冲击，欧盟及其成员国不得不暂时将财政方面的限制抛诸脑后，积极运用财政手段托底经济，抗疫纾困。这意味着后疫情时期，欧洲经济势必在远高于当前水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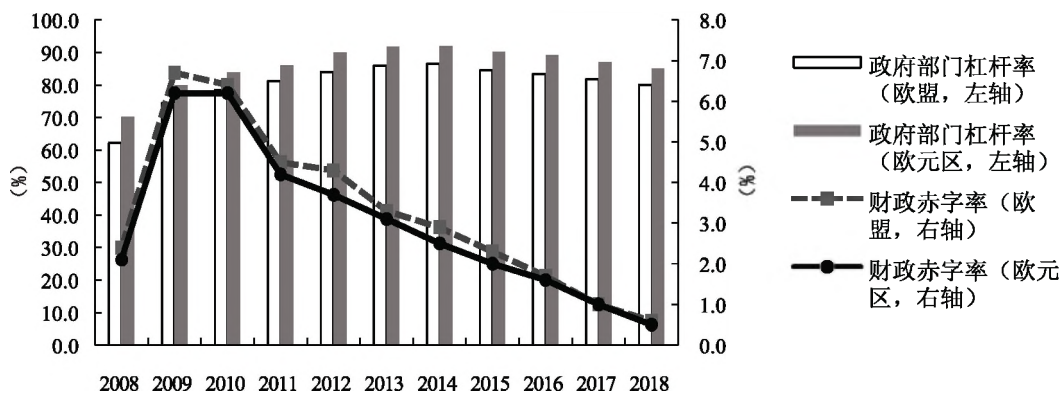


图3 2008—2019年欧盟及欧元区财政赤字与政府杠杆率情况

资料来源：Eurostat。

公共债务规模下运行。以意大利为例，根据信用评级公司惠誉的估计，2020年底，意大利政府债务占GDP比将从2019年的134.8%上升至156%。

短期内欧洲各国政府可以依靠欧洲央行大规模的流动性释放来稳定资金成本，避免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但在中长期，更高的公共债务占比必然伴随着更大的债务违约风险，一旦欧洲经济未能及时实现复苏，主权债务危机的阴影将卷土重来，届时各国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化解这一风险，欧洲央行又是否有空间为金融体系注入更多流动性，实属未知之数。

同样暴露于风险之下的是欧洲的银行体系。新冠疫情期间，欧洲银行的资产质量受到较大负面影响。一方面，疫情让欧洲企业生产经营和居民就业承受巨大压力，部分现金流紧张的企业和居民可能出现信用违约的情况，致使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另一方面，欧洲银行体系作为政府债券的主要持有者，因债券收益率走高而面临资产价值缩水。这对于一些还在消化上一次危机遗留下来的不良贷款，资本缓冲较为匮乏的银行来说是危险的。欧洲经济重启后若在一段时间内都表现不佳，那么在较大概率上私人部门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将持续叠加，并带来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的大幅上升。

（三）阵营分化加剧政策不确定性

在经历了疫情早期各自为战、欧盟统筹协调缺位的混乱局面后，欧盟成员国开始逐渐意识到团结互助的必要性。以德国为代表的核心国家克制了自保倾向，主动向邻国开放医疗服务机构，以实际行动推动欧洲团结抗疫。欧盟民事保护机制亦开始发挥作用，各国间防疫物资运输及医护人员流动逐步有序运转。

危急时刻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态度表明，近些年欧洲一体化虽经历了诸多风雨，其根基却尚未遭到破坏，这无疑给后疫情时期欧洲一体化的推进带来一丝希望。然而，这场

疫情也让人们看到，欧盟内部阵营分化的趋势愈发明显。西欧、北欧、南欧以及东欧国家由于自身经济状况和受疫情侵袭程度的不同，在抗疫斗争中的诉求存在显著差异，这点尤其体现在对欧盟经济援助的态度方面。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且财政资源匮乏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急切希望欧盟能够通过发行共同债券的方式刺激经济，而一直奉行节俭政策的国家则不想轻易放弃对自身财政的掌控权，转而希望欧盟将精力集中在疫情防控 and 行业纾困上。受疫情影响程度相对较低的北欧和东欧国家更不情愿看到欧盟“掏腰包”，后者甚至暗暗抱怨欧盟将原本用于减少成员国发展差距的凝聚力基金直接改做了抗疫基金。

欧盟内部这种阵营分化在后疫情时期只会有增无减。一方面，经疫情洗礼后，欧盟成员国普遍都将背负更沉重的债务负担，各阵营对经济利益争夺和财政风险分担将更为敏感；另一方面，欧盟在恢复经济的路线图中明确表示，未来投资重点为绿色经济、数字化转型和现代化领域，这意味下一个七年的欧盟长期预算很可能需要削减支持农业发展的共同农业基金和凝聚力基金。该举措将削弱欧盟预算转移支付的职能，并导致欠发达地区人民收入水平、公共产品的减少，长期以来一直遭到东南欧成员国的反对。在疫情爆发前的预算谈判桌上，各方已然就此僵持不下，如今疫情使德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欧盟强化了加快经济绿色和数字化转型的决心，以求领跑全球经济复苏竞赛，这必然导致欧盟内部利益冲突的加剧。

因此，纵然没有分崩离析之虞，欧盟在后疫情时期也不得不面对内部阵营间更加尖锐的利益冲突。这为欧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增添了不确定性，而这种政策不确定性又将反过来影响企业和居民的投资及消费信心，给经济增长造成压力。

四、欧洲经济的出路

（一）修复疫情损伤，推动经济转型

新冠疫情的爆发使欧盟再一次清楚认识到自身经济状况的脆弱性。为修复疫情所带来的损失，增强经济韧性，欧盟委员会于 2020 年 4 月中旬公布了共同复苏路线图，随后，欧盟及其成员国领导人就设立万亿欧元级别的“恢复基金”达成一致，以作为共同复苏方案的资金支持。尽管“恢复基金”的具体规模、来源与资金性质等问题目前尚未有定论，但就共同复苏路线图来看，倘若欧盟的这项计划能够顺利落实，欧洲经济走出泥沼指日可待。

根据路线图，欧盟修复和强化内部经济发展的着力点主要在于单一市场建设和大规模投资计划。前者主要强调深化单一市场，建设欧盟银行业和资本市场联盟，修复和重

建欧盟内部的价值链和供应链，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后者则提倡在绿色经济、数字领域能力建设等重点项目上的资金投入，引导各国经济向绿色和数字化方向转型。显然，这些战略设想对现阶段欧洲经济的复苏与转型而言是十分恰当和有益的，它们也是近几年欧盟一直酝酿并推行的战略调整。真正的难点在于，欧盟及其成员国是否有能力使这些设想成为现实，它决定着欧洲经济最终能否破茧而出，在后疫情时期重新走向繁荣。在此过程中，欧盟的行动力和协调力、成员国的凝聚力和合作精神都将面临极大考验。

（二）维护多边主义下的全球贸易流动

世界贸易组织（WTO）在2020年4月8日发布的《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中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将缩水13%~32%，即便因抗疫而实施的隔离管控措施被撤销，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也可能较疫情前进一步抬头，为全球贸易环境带来压力。在此情形下，坚持多边主义，在全球贸易方面维持有效领导，确保国际贸易规则得到尊重将有助于欧盟这个全球第一大贸易集团稳定对外贸易局势，从而降低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对欧洲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

此前由于美欧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欧盟就已致力于通过区域和双边谈判来应对国际贸易体系风险。2018年下半年，欧盟通过加速与贸易伙伴进行新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以及现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升级谈判，来巩固与贸易伙伴的关系，促进构建适应贸易发展新模式的贸易规则体系。2018年7月，欧盟与日本签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该协定经欧洲议会批准后，于2019年2月开始实施。随后，新加坡、南美、越南先后与欧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亦与欧盟于2020年4月完成贸易协定的升级，基本免除双方之间所有商品贸易的关税。与此同时，在WTO改革领域，欧盟也提出多项改革方案，力求发挥引领作用，并于2019年12月，与部分WTO成员合作，制定了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这些举措显示了欧盟遏制贸易保护主义，鼓励开放、合作与协调的决心，是后疫情时期欧洲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

（三）加强中欧经贸合作有助于欧洲经济脱困

过去40年，中欧经贸合作取得了长足发展，欧洲企业于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也收益颇丰，双方在进一步合作往来方面，不存在本质上的分歧和利益冲突。1999年到2019年欧盟对中国的进出口均处于稳步上升阶段，1999年欧盟对华进出口总额分别为525.97亿欧元和196.59亿欧元，而2019年增长到了3613亿欧元和1983亿欧元，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2019年，中国是欧盟第三大出口市场，出口占比9.3%，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同时也是欧盟第一大进口国，进口占比18.7%。

不仅如此，随着加入“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数量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看到了“一带一路”的机遇。中欧经贸合作能为欧洲经济恢复带来很好的机遇，一方面，它能给欧洲国家带来新的贸易发展空间，以意大利为例，意大利诸多国际知名品牌和先进技术，可以与中国的大市场对接，这对意大利疲软的经济而言，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周边大部分国家受制于基础设施供给不足，致使近年来经济增长放缓，而中国具有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在多数基建相关行业也有一定产业实力，能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国际产能合作奠定基础。未来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和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能促使欧洲和中国在贸易、投资、海运、旅游等各领域上不断加强合作，进而带动欧洲当地经济发展。

五、结论与建议

新冠疫情的肆虐给欧洲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负面冲击，欧洲经济年内陷入衰退基本已成定局。欧洲央行大规模流动性释放和政府财政救助措施成功避免了危机爆发，却难以在短期内改变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和金融风险，以及欧盟内部阵营分化趋势。为走出经济困境，欧盟有必要及时推进经济转型，完善自身建设，并通过维护多边主义下的全球贸易流动，稳定对外贸易形势，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

目前，中国与欧洲在和平解决全球冲突、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共同利益，双方均有意捍卫以联合国和 WTO 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因此，在后疫情时期，中国可加强与欧洲的发展战略对接，联手维护现有国际贸易秩序，努力实现合作共赢、共同繁荣。具体可考虑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是加强中欧 WTO 工作组的交流，共同推进 WTO 改革。WTO 是国际经贸领域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最重要的多边规则体系，其权威必须得到尊重。WTO 的缺陷应该通过新的谈判加以弥补，这是中国和欧洲所拥有的共识。中国与欧盟在 2018 年着手合作进行 WTO 改革，并形成工作小组，这对于促进 WTO 体系改革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未来可加强工作组交流，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群体的立场。

二是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中欧全方位的合作。目前，中东欧 16 国和希腊都与中方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意大利、卢森堡等其他欧洲国家也同中方签署了有关合作备忘录。不少欧洲企业也都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将带来新的商机，有意愿参与到相关项目中去。然而，根据中国欧盟商会的调查，88% 的欧洲受访企业表示，合适的项目和信息的缺乏导致它们无从参与。因此，不仅仅将共建“一带一路”停留在国家战略层面，而更多地让中欧两地企业实际参与进去，真正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体

系，也是中国未来应当在中欧合作中予以重视的。

三是加快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始于 2013 年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原本有望在 2017 年完成，但由于双方在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国有企业竞争中立等重要领域存在分歧，沟通一直在持续。加快谈判进程，以便在 2020 年达成高水平的中欧投资协定，不仅标志着双方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投资自由化的决心，也有利于加快两大经济体本身的经济改革与升级。

参考文献：

1. 东艳：《欧洲经济：内生动力减弱，外部风险增加》，《2019 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
2. 冯仲平：《新冠疫情下的欧洲战略困境与中欧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4 期。
3. 陆婷：《七年一度的欧盟财政“大戏”》，《环球》2020 年第 7 期。
4. 张健：《新冠肺炎疫情与欧盟的“生死抉择”》，《世界知识》2020 年第 8 期。
5. 张梦云、易焯：《详解海外“抗疫”财政救助政策》，《财新》2020 年第 4 期。
6. European Central Bank. *Economic Bulletin Issue 2/2020*. Frankfurt, 2020.
7. European Commission. *A Roadmap for Recovery: Towards a more resilient, sustainable and fair Europe*. Brussels, 2020.
8.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Coordinated Response on Coronavirus: Questions and Answers*. Brussels, 2020.
9.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European Council,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The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And The Eurogroup*. Brussels, 2020.
10.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The Great Lockdown*, Washington, DC. April, 2020.
11. Wolff, Guntram. *Why Europe Needs a Change of Mind-set to Fend off the Risks of Recession*. Brugel Blog, September, 2019.

责任编辑：谷 岳

promoting high-level opening up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focus o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comprehensive benefits of using foreign capital, taking the “Belt and Road” as a guide to expand new space for foreign investment, building a safe and efficient financial opening system, promoting the balanc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opening-up, and promote open platforms such as Pilot Free Trade Zone and free trade ports to become a high-level open economic new system pioneering demonstration areas,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etc. In conclusion, it put forward the main ideas and measures to promote high-level opening-up.

(4) The Dilemma and Way-out of European Economy in the Post-pandemic Period

Lu Ting, Dong Yan

Affect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European economy contracted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0, and a number of economic data hit historical lows. In order to support people's livelihood and support the economy,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acted swiftly and issued a series of bail-out measures to avoid the outbreak of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As the pandemic gradually stabilizes, the European economy enter the post-pandemic period, and it will still face many challenges and risks. It is difficult to fundamentally reverse the situation of recession during the year. The key to whether the European economy can get out of the future is whether the EU can successfully achieve economic and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effectively maintain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under multilateralism, and whether China-EU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can be further deepened.

(5) Global Digital Service Trad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rend Prospect

Mei Guanqun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global digital service trade is showing a vigorous development momentum, the scale of trade is continuously expanding, the trade format is more abundant, and it has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s. The biggest constrai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digital services trade is that currently there are no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governance rules with a unified framework. Major econom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re engaged in fierce competition and game in the process of formulating rules, and new variables are constantly appearing on some specific topics.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digital service trade will coexist.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ill bring more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greater development space for digital service trade, but a fragmented international rule system and trade protectionism tendencies will restrict its development.

(6) How to Break through the “Double Restrictions” of Poverty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Distressed Area

Liu Xuemin

Distressed areas are often in ecologically fragile regions, the development faces the dual tasks of poverty reduc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herefore, in the same battlefield, two